

• 昆仑文学丛书
• 昆仑出版社 / 出版

第七个 春天

Diqige Chuntian

张廷竹 / 著

本

书收入作者的两部中篇小说。

《第七个春天》是采自

南疆的一束硝烟，一团烈火，铁血男儿的赤胆热肠，战地风云的奇诡变幻，边关与内地丝丝缕缕的血肉联系，为作品增添了丰厚而深刻的内蕴。

《路其远兮》由一个经历





第七个

春天

张廷竹／著

昆仑出版社／出版

第七个春天

张廷竹 著

昆仑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北京二二〇七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8 $\frac{1}{8}$ ·插页1·字数147,000

1988年5月第1版·198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ISBN7-80040-028-X / I·24

定价：1.80元



我想唱出一曲战地人生的咏叹调来。咏的是出征将士高尚纯真的人性美，以其黄钟大吕之声震撼人心的民族精神，悲壮美和勇武美；叹的是社会与时代残留的鄙俗的一面，太阳的黑子，落在当代军人身上的阴影。

張廷竹

作者小传

张廷竹，男，祖籍湖南安乡，1950年生于香港，刚满月即由母亲携回大陆定居。由于家庭境遇坎坷，青少年时代生活十分艰辛。十四岁小学毕业即下乡插队，八年后招入杭州某造船厂做工，当过锻工、供销员、科长、厂长助理。1984年特招入伍，任某野战军新闻干事。1985年春赴中越边境参加老山地区防御作战并荣立战功。现为济南军区创作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

张廷竹自1980年发表作品，至今已创作长篇小说两部，中篇小说二十六部，短篇小说四十余篇，报告文学和文艺评论亦间或为之。小说集《五十四号墙门》、《阿西门的笑》、《二妹子》等相继问世，在海内外读者中有较大的影响。

序

丁临一

“创作，到底是容易，还是很难？”

——记得是去年八月，在古丝绸之路上，应中国作家协会邀请，我们一行二十人组成的部队作家代表团前往敦煌参观访问的途中，一个稚气未褪的文学爱好者曾在联欢会上向我提出过这个问题。当时，沉吟了半晌，我好象作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

实在说，这确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即以我较为熟悉的部队作家为例吧。我读有些人的作品，就明显地觉出作家从总体构思到人物情节、直至遣词造句，可谓竭尽心力，惨淡经营，刻意求工，他们写得那么慢，那么少，有时一年只拿出一两部中短篇来，尽管质量很不错，但还总是不满意，似乎常常在象福楼拜那样责备自己：“写出这样的东西来，真应该打嘴巴。”这样的作家，朱苏进也许可以算是有代表性的一个，而在我们的部队作家群中，还可以拉出一个长长的名单来。在这些作家

面前，我就会深深感到，创作是何等何等不易的事呵！而有时读另一些人的作品，感觉则截然不同，看他们从容挥毫，涉笔成趣，或而意在高山流水，转瞬又及沧海桑田，洋洋洒洒数万言竟是一气呵成之势，撒得开去又收得拢来，一支笔极是得心应手，在他们来说，一年写上十几万字、甚至几十万字也根本不是什么难事。这样的部队作家，我们也可以拉出一个长长的名单来，而张廷竹，无疑就是这样的“写得容易”的作家中极典型的一个。从一九八〇年开始发表作品以来，迄今为止他已发表的长、中、短篇小说有数十部之多，而报告文学和文学评论他也“间或为之”，他作品的总字数目前已超过三百万字，相继问世的小说集我所知道的就有《阿西们的笑》、《二妹子》、《五十四号墙门》等等。这本小说集，是他在军队的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作品集，至于到底应该算作是他的第几本作品集，那就连我也说不确切了。

张廷竹的的确确“写得容易”，但他所写出的又的确确都并非是脱离生活、胡编滥造的文字，恰恰相反，他的作品倒常常是相当切近社会现实生活的。大致地考察一下张廷竹的创作发展历程便不难发现，从他早期的创作一直至今，他的作品中都常常闪现有他自己生活经历的影子，他的作品都或直接或间接地触及到当代中国的社会和人生的某些问题，或正面或侧面地反映出当代中国的社会和人生存在的不同形态，或详尽或简略地记录了中国当代不同类型的人们的思想、感情、志向、意趣的发展和变化的历

史。本书所收的两部中篇亦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张廷竹确实在生活中为一个“范德臣”式的人物的落实政策而不厌其烦地奔忙过（尽管《路其远兮》中的“我”的一切与张廷竹本人的一切相距甚远）；张廷竹也确实在南疆前线、在某侦察大队以作家和战士的双重身分生活过许久并且荣立过战功（尽管《第七个春天》中的“小说家”也不宜与现实生活中的张廷竹本人划上等号）。从这个意义上说，最会编故事的张廷竹倒是从不曾凭空“编”过什么的，他只不过将真实的现实生活精心地“组织”了一下使它更集中、更真实而已。张廷竹的作品，显然属于以经世致用改造社会为崇高使命的社会文学的一部分，在张廷竹的身上，那种中国文人世代相传的“感时忧国”精神和“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大夫使命感，那种“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王安石）、“文所以载道犹如车所以载物，不载物之车，不载道之文，虽美其饰，亦何为乎？”

（朱熹）的中国传统的文化背景和文学精神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当然，作品十分切近社会现实生活，并且较直接地以经世致用改造社会为使命和目的，这是张廷竹创作的特点，同时也是我们多数部队作家创作的基本特点。而张廷竹作为一位以地方作家身分“特招”入伍的部队作家，其创作上与我们不少“土生土长”的部队作家们的区别也是较为明显的，这种区别就是我在与张廷竹的一次文学通信（载于《解放军文艺》1986年5月号）中所指出的，张廷

竹（同时也包括韩静霆、朱春雨等以地方作家身分“特招”入伍的一些部队作家）的创作在表现生活、特别是表现军营生活时，所取的艺术视角常常偏重于外部的、立体的，其审美趣味常常偏重于复杂的、多变的，其艺术观照方式乃至价值观念等方面常常偏重于批判性的。这最后一点——作家对于生活的偏重于批判性的艺术观照方式亦即作家对于生活的强烈的审视意识、批判意识，我以为，这在我们许多部队作家的创作思想准备方面还是一个较薄弱的环节，因此值得着重地提出来谈一谈。

“批判”一词，我们历来是在它的狭义意义上来使用它的，所以为了避免在概念理解上的不一致问题同时也免得重新为“批判”正名而花费笔墨，我们在论述中仍然沿用这一狭义的概念。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着重谈张廷竹作品中的批判性、批判意识问题，这并不意味着张廷竹在作品中仅仅只是瞪大眼睛一味盯住社会生活中的问题、盯住某些假恶丑现象予以暴露和批判，而对于社会生活的光明面、对于真善美则表现不力甚至于有意忽视了。恰恰相反，作为一位社会责任感很强的作家，张廷竹在作品中对于真正的生活主人公、对于大写的人的刻画和赞颂是异常注重、充满热情的。在《第七个春天》中，作家笔下的那些英雄的当代军人群像——少壮派侦察科长洪明生，战士黄细毛、周不农、赵志华，军医宋亚丹，都在现实生活的艰窘境遇与平凡而又崇高的思想境界的高反差对照下焕发着动人的熠熠光彩。即如《路其远兮》中那个貌似平平庸

庸、窝窝囊囊的杂货店主范德臣，在几十年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情况下，忍辱负重认认真真不卑不亢地生活着，就是一曲不同寻常的人的颂歌。在这些普普通通的人物形象身上具体地体现着、并且最自然地升华而出的，是人的正义感、尊严感、意志力量、道德力量、追求热忱和牺牲精神。这种发自作家内心的对于社会生活中的真善美的热情的刻画和赞颂，无疑反映着作家忠于生活、热爱生活的创作态度。

张廷竹作品中体现出的强烈的批判性、批判意识，同样是作家忠于生活、热爱生活的创作态度的鲜明反映。对于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对于社会的问题和弊端，无论它存在于军营内或军营外，无论它属于历史遗留的或当代产生的，也无论它如何尖锐、如何复杂，作家一经发现便都在作品中毫不犹豫地予以了揭露、剖析和批判。在《第七个春天》中，战士赵志华贴出的那副对联是令人触目惊心的，与此相关联的一系列问题，诸如渗入前线战场的不正之风问题，按政治工作的老习惯在战场上“排重点人”而委屈了相当一些忠诚战士的问题，都直接地、严重地危害军心和影响士气，而作家的笔锋所向，不仅鞭笞了黄副处长这样的势利市侩，而且无疑也会触疼许许多多颗面对许许多多的问题和弊端、因了许许多多的原因而渐趋麻木的心灵。在《路其远兮》中，作家则触及了一个更复杂的问题，触及到了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尊重历史、德昭天下与那种被“左”的一套毒害弥深、假“革命”的名义甚至否定

了信义和良心的伪“共产党人”的矛盾和冲突。围绕着给范德臣落实政策的艰难经过，作品为我们引出了几种类型的共产党员的形象：一种如老将军、如叶副司令、如朱营长已故去的父亲，一种如前地下党员、退休的干部赵拯民，再一种即如张干事和“我”这样的年轻的一代人。其中的赵拯民着墨不多，但委实是颇为复杂、颇有深度的人物形象。应该说，赵拯民对“革命”是颇有几分虔诚精神的，当他还是一个青年学生的时候，他就以反抗封建地主家庭的实际行动表示了对“革命”的热情向往。建国以后身为一个有文化有知识、读过《资本论》的受人尊重的基层领导干部，他仍然认定自己由于“是地主家庭出身，又念了那么多年反动的书”，因此永远也没法跟真正的工农干部相比，他是以心甘情愿地当“次等公民”的态度来显示自己的“革命”彻底性的。也许正是这种走火入魔的“革命”精神，导致他在五七年为争当“整风积极分子”而积极过头反被打成了“右派”的，然而此人倒“虽九死而未悔”，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多年，他仍然对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一切看不惯、想不通，坚持宁可不吃菜也要独自抵制农贸自由市场的“革命”行动。在他看来，“革命”才是目的、是至高无上的，而为了达到一个“崇高”的目的，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手段都不为过分。因此他手里有权的时候，今天可以给人封官晋爵“利用”其为“革命”奔走，明天这个人的“利用价值”已经不复存在了便可以毫不犹豫地剥夺其一切正当权益甚至沦其为

阶下囚；今天可以信口许诺“保证生命财产安全”以召唤敌手投诚，明天一旦敌手放下了武器便可以马上翻脸不认帐大开杀戒。“什么叫‘言而无信’？对阶级敌人有什么信义可言？”赵拯民的振振有词显示着一种极其雄辩的“革命者逻辑”，而这种逻辑对于我们真正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形象的损害，对于以解放全人类为崇高目的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歪曲，应该说实质上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只要把赵拯民的形象与作品中同样着墨不多然而光彩粲然的叶副司令的形象稍加对比，我们就不难分出鱼目与珍珠、瓦釜与金钟的质地的完全不同。作为一个真正的革命军人、共产党员，叶副司令在“史无前例”的动乱年代中，即便被“造反派”们用最残酷的刑罚所威逼，也决不对范德臣、林自强这样的起义投诚的前国民党军官落井下石以显示自己的“革命”或企求自己的解脱。在这里，叶副司令形象的巨大的感召力，首先可以从其内在地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中得到解释，他的正直、耿介、无欲而刚、言必信行必果以及受惠不忘恩、施恩不图报，无疑都是我们民族美德的传统积淀的表现。而他在为范德臣落实政策问题上，热情肯定“我”、小朱营长、金干事等等一代年轻人的见义勇为，真诚地“为老范高兴，也为整个民族高兴”，这就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更深远的眼光和胸怀。无怪乎，“我”在叶副司令思想胸怀的感召下，一下子感到了精神的顿悟和灵魂的升华，一种平平凡凡的朴素的同情心一下子与“历史，责任，人类，民族”

都联系了起来。不难看到，通过叶副司令的形象，作者把两种价值尺度——宽怀古朴的民族的价值尺度与宏阔高远的共产党人的价值尺度——巧妙地统一起来了，而在叶副司令与赵拯民形象的对比中我们更可以感受到作家的思想批判的锋芒：对于赵拯民那种走火入魔的“革命者逻辑”，那种不仅是背离了共产党人的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和胸怀天下的精神宗旨，而且也背离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基本的做人道德的所谓“革命者逻辑”，难道我们不应该彻底地予以否定并且坚决地将其丢进历史的垃圾堆去吗？

值得考虑的是，张廷竹作品中对于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对于社会上的问题和弊端的揭露和批判，是不是属于那种不分芝麻西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东西呢？他的作品中常常出现一些随机性的小讽刺、小幽默，有时连电视台的广告和除夕晚会的对奖都要顺便地刺它们一刺（见《第七个春天》），这是不是一种纯渲泄式的表现呢？我想，细细分析张廷竹的作品就可以发现，从表层现象看来，他的笔所指向的常常是一些“左”的思想偏见、僵化的方法制度、现实的沉渣泛起等等极具体的甚至是极琐细的问题，但实际上他所选取的情节、细节、人物的言谈举止等等都是经过了一定思考的，他并非是固定地站在一个位置上向着四面八方盲目地分散射击，而是在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方位、角度，在从四面八方向着一个靶子射击——他所揭露、所批判的都是或直接或间接地对于作为人的我们的战士、我们的人民的生活、性格和灵魂起着压

抑、扭曲甚至是戕害作用的人和事，他的作品深层意蕴都集中于对人的理解、对人的尊重、对人的爱护的殷切的呼唤和热诚的肯定。《路其远兮》是这样，《第七个春天》是这样，我所读到的张廷竹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这样。正因为如此，我们说，张廷竹的整个创作与我国新时期整个当代文学创作的主流向——人的重新发现，人的觉醒和解放是完全一致的，他的作品以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的人作为基本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极有意义的是能够站得住的；也正是基于此，我们说，张廷竹作品对生活的批判并不是随意性的盲目指责式的而是有选择有思考的，作家所具备的批判意识亦不是无准备的肤浅的而是有准备的有一定深度的。

我以如此的热情来分析、肯定张廷竹作品中的批判意识，其用意当然不仅仅在于张廷竹的创作本身，因为我是深深感到有必要指出，既然张廷竹同志的创作已经证明批判意识对于一位作家一部作品来说是十分可贵十分重要和必要的，那么我们的部队作家队伍就需要在这一较为薄弱的创作思想准备方面普遍地提高一下认识并且加强一下自己。批判意识——也许我们的有些同志仍然不大能习惯、不大能接受这种提法——它竟是我们的部队创作人员们所必不可少的么？回答是十分肯定的。近年来，随着我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发展进程，整个创作界和理论批评界都充分地意识到了、并且明确地提出了进一步扩大和更新文学艺术观念的要求。这一新的要求的核心，我理解就是要最终确

立与社会、与自然处于三角对立关系之中的“人”在文学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是要文学能够从诸多方面来揭示人的全面的真实，包括过去的文学中很少涉足的人的除政治思想之外的心理机制乃至生理机制都不应该被忽视。人是文学的主要观照对象，但在具体的文学作品所提供的特定环境之中，人又必须能够充分体现出其主体性和能动性，再也不能允许改头换面出现的、使人成为某种理念之下的僵硬的傀儡的现象。在这种新的、也许是真正具有文学意味的文学观念指导之下，我们的文学创作所反映、所探索的就不再仅仅只是“社会”这一个方向，而是至少要同时包括对“社会”和对“人生”的反映、探索这两个主要方向。在这两个主要方向上，文学的总主题也应该是“在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冲突（或妥协、或和谐）中寻求现实生活走向理想生活的道路”与“在灵与肉、精神与物质的对立冲突（或妥协、或和谐）中寻求自在人生走向自觉人生的道路”这二者的统一。由上述这个总主题，我们不难看出，作家从事创作是绝对离不开对社会、对人生的审视与思考的，因此，“批判意识”之于作家和作家的创作，本属题中应有之义。只有那些专门凭借某种现成的理念、概念去从事“创作”的人才会不需要批判意识，但这也并不说明他们自己不具备批判意识，只不过他们所具备的是那种人云亦云、吠形吠声的“批判意识”罢了。也同样是出于上述这个总主题，我们还可以再回过头来挑一挑张廷竹作品中的不足。我们可以说，张廷竹所具备的批

判意识，无疑还需要继续经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而张廷竹今后的作品创作，无疑也还需要在继续注重社会审视、社会批判的同时予笔下的人物以人生审视、人生批判方面更多的关注和思考。我觉得，对于张廷竹这样一位创作上颇有成绩颇有特色并且还颇有潜力的作家，我们是有充分的理由对其寄予期望并且不断地对其今后的创作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至于张廷竹作品的艺术上的特色，我不准备在这里展开谈了，读者不难看到，张廷竹的“写得容易”，除了生活积累、思想准备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即是他艺术表现上的自然纯熟。质朴，自然，生活化，雅俗共赏，这就是张廷竹作品的艺术特色和追求。也许他愈是写得自然写得生活化写得不事雕琢，他便愈是“写得容易”；而他愈是“写得容易”，在艺术上也便愈是趋向自如纯熟。这是一种良性循环的关系。当然，这种良性循环关系的形成，无疑还是需要经历一个过程的，而在这一形成过程之中，我们年轻的、过去仅持有初中文凭（今年他已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深造）的作家吃过多少苦头、碰过多少“钉子”、走过多少弯路、熬过多少不眠之夜，一句话，他是如何地“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他付出过多少劳动和心血，我们虽然知焉不详，但恐怕也不难想象。实在地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是容易做成的，文学创作尤其是这样。因此，我们说张廷竹“写得容易”，无非只是一种比较的、相对的说法而已。而对于“写得容易”的

张廷竹来说，他在今后的创作道路上，无疑还需要注意防止自己因写得快写得多而陷入某种固定的思维定势、或者总是沿袭自己惯用的艺术结构和表达方式，需要高度地警惕自己重复自己的情形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应该说，写得容易的作家也好，写得艰难的作家也好，所面临的创作上的思想艺术追求都是永无止境的，而真正有志于献身文学艺术的人，唯有在从易到难、从难到易这样一个循环往复、永无尽头的创作实践历程中持续努力永不懈怠，方可能真正地有大的建树和作为。这末一点，亦可以算作是我对我所喜爱的“写得容易”、然而走到今天这样一个创作高度上实在并不容易的作家张廷竹同志今后创作的衷心的和良好的祝愿。

以上，便权充作序。

1987. 7.27—9.1 于北京